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建筑是历史的年鉴。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在中国人民心中拥有极高地位。在长期遭受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和遏制的背景下，“十大建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成竣工，成为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迹。

## 承载着全国人民的期待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建筑事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工农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建设首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如何让城市为群众服务等一系列问题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

1958年8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公共建筑为国庆献礼。经过反复筛选研究，最终确定修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全国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并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在这个名单里，既有大会堂、国宾馆、民族饭店等服务于国家政治生活、国际交往的需要，又有农展馆、火车站、体育场等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考量的安排。这“十大建筑”承载着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也寄托着共和国昂首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

那时候的新中国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建造过10层以上的楼房，机械制造技术和能力也非常有限，要完全不依靠任何外国专家的设计和施工力量，在不到400天的时间里建造10座大型建筑，其艰巨程度难以想象。与同时期世界其他著名建筑相比，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于1947年动工，1952年落成，耗时6年；日内瓦万国宫于1931年开工，1937年竣工，耗时7年；比“十大建筑”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也花了十几年时间才完成建设。

然而，“十大建筑”的总面积超过

67万平方米，从规划设计、房屋拆迁、到地质勘探、备料施工，再到装饰装修、落成试用，一共用了不到1年时间。特别是人民大会堂，其面积之大、功能之多、设备之众均突破了当时的记录。如今，无论从质量还是审美的角度，“十大建筑”都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成为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经典作品。

回望那段历史，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邵韦平表示，“十大建筑”达到了当时专业技术的先进水平，奠定了北京今天的城市基本格局，它为后来我们探索建筑服务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经验，是我国建筑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 书写建筑史上的奇迹

在“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最为艰难。到1958年国庆节前夕，民族文化宫已开始兴建，其他建筑因使用内容和要求比较具体，设计方案也都相继完成。唯有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迟迟无法确定。

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大会堂的方案进行了7轮评比论证，来自18个省市的30多位建筑师、教授提出多种方案，共形成84个平面图、189个立面图。原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在《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中这样写道：“施工部门和材料部门都在催促出图，因为工程必须在次年8月底完工，才能赶上1959年国庆节使用，只有短短10个月，大家怎么会不急如焚！”

关键时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了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对这项工程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和支援。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告诉记者，大会堂的设计除成立专家组外，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要发动群众，鼓励年轻人各抒己见、坦率交流，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为后来大会堂的建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根据记载，建造大会堂所需的建筑材料和装饰设备，全部采用国产产

# 「十大建筑」见证奇迹

本报记者 康琼艳

品——辽宁的钢材、天津的电线、上海的电梯、南京的灯泡、杭州的锦缎……分布在23个省份的200多个工厂，开足马力为大会堂赶制各种材料。

随着工程的推进，青年人在各工种中发挥了带头突击的作用。比如，“张百发钢筋青年突击队”，300多人奋战9个昼夜，绑完了680吨基础钢筋，使延后的工期顺利赶上了整体施工进度。

据统计，在大会堂施工的10个多月中，每天有1.4万多名建设者活跃在工地，累计有30万人轮流参加了劳动。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解放军官兵、学校师生、普通市民、机关干部，也有老工人、老农民和家庭妇女。这些远道而来的建设者，喊出了“把6亿人民的大会堂建设得更好更美”的口号，在工地上昼夜奋战。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徐全胜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出了“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北京在短短10年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截至1959年8月底，北京新建房屋的建筑面积约达2724万平方米，为原有建筑面积的1.3倍，相当于新建了一座北京城。

## 见证六十余载风雨征程

关于“十大建筑”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总理曾指示：要贯彻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提出，“十大建筑”要体现“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物为人用”的思想，既要庄严雄伟，也要平易近人。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引领下，我国设计师、建筑师不拘一格，兼收并蓄，开启了中国本土建筑设计民族化探索的步伐。

马国馨说，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是“十大建筑”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周恩来总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长远的政治眼光，为十大工程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是“十大建筑”深受百姓认可并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



图① 原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铸为周恩来总理讲解人民大会堂方案。  
图② 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③ 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建院供图）

在大会堂施工过程中，有人提出，万人大礼堂层高过高，显得人很渺小，但观众席的两层挑台又使人感到压抑。这个看似矛盾的技术难题被周总理用一句王勃的名句点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周总理的启发下，设计师把顶棚做成象征天体空间的大穹隆形，与墙身交接处则由直线改为圆角，形成了浑然一体的效果。穹顶上，三层水波形的暗灯槽围绕着红五角星，500个灯孔点缀其间，观众一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丝毫不会感到生硬和压抑。

邵韦平表示，“水天一色”的绝妙构思具体而生动，避免了空间尺度失衡，体现出人民殿堂的亲合力，这在树立文化自信方面给予了我们积极的启示，是中国建筑文化和技术发展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各人民团体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这里锚定启航；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了千余位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中美建交的新闻从民族饭店传向世界；华侨大厦更是见证了海外侨胞投身祖国怀抱的拳拳赤子情；中国国家博物馆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会客厅一般的存在。“十大建筑”也开创了多个领域的先河：第一个综合类军事博物馆，第一个全国性农业成就展览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主会场，第一个大型预制装配式结构建筑……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时代的缩影。几十年来，一座座壮丽华美的建筑拔地而起，北京国贸大厦、鸟巢国家体育场、上海金茂大厦、广州“小蛮腰”……这一栋栋建筑折射出中国发展的勃勃生机，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前进过程中最有力的注脚。

没有先例可供参考，也无外援可以求助，最关键的是留给设计师的时间也极为有限。为赶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之前完工，大会堂的建造采用了非常规的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做法。“如果结构大样弄不出来，后续施工就没有时间了。”李国胜解释。

面对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李国胜和同事们信心百倍，写下了决心书和保证书。李国胜清楚地记得，为了密切配合施工和备料，把设计院和工地之间不足4公里的车程时间节省出来，他和同事们于当年12月便搬到工地进行设计。那段时间里，画图桌旁整天都围满了工人师傅和备料人员。没有计算机，也不懂系统工程学，设计工作千头万绪，加班加点早已稀松平常。

在党的号召下，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紧密团结，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为了尽快出图，50多人的结构团队苦干加巧干，打破常规顺序，简化绘图方法，确定了统一的设计资料、计算步骤，还制作了大会堂工程专用图表。“这些做法对于提高效率、保证质量、便利施工起到了重要作用，集思广益是大会堂得以胜利建成的宝贵经验。”李国胜这样评价。

最终，结构组只用了3天就画出了基础刨槽图，又用了3天画出基础施工图，后用1个星期画出地下室顶板结构图，累计出图3600余张。

时至今日，李国胜依然保留着大量当年建造大会堂的图册、小结、工单等。他说：“我岁数大了，当要追溯某些具体问题，图纸资料是很重要的，大会堂的资料坚决不能丢。”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市开展房屋大检查，40多岁的李国胜爬到大会堂顶棚里，里里外外详细检查。此后的40多年里，人民大会堂陆续进行抗震加固、消防改造、外墙保温、设备更新、增设空间等多项工程，每一次都少不了李国胜的身影。2020年，大会堂北京厅、山东厅进行升级改造，精神矍铄的李国胜老人家依然活跃在第一线。“虽然我从1959年9月16日就离开了大会堂工地现场，但是大会堂的结构设计是我参与的，我要对它终生负责。”李国胜说。

在李国胜眼里，人民大会堂蕴含着劳动人民的心血，也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回忆起那段干劲冲天的红色岁月，有着65年党龄的李国胜百感交集：“建筑就是历史，建筑就是文化。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能参与这场伟大的实践，是我莫大的荣幸。”

## 亲历者说

# 对人民大会堂负责到底

本报记者 康琼艳



人民大会堂建设施工现场。（北京建院供图）

“宴会厅屋顶宽48米，长54米，万人大礼堂台口上方32米跨度，观众厅三层挑台的钢梁悬挑长度分别为16.6米和15.5米……”眼前这位满头银发、戴着眼镜的老者便是当年人民大会堂结构工程组设计师李国胜。说起大会堂，已经88岁高龄的他思路清晰，侃侃而谈。

1958年10月，李国胜所在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第一设计室承担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的设计工作，25岁的他被分到大会堂结构组工作。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与大会堂的渊源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直到现在，每当大会堂进行结构安全检查、改造、扩建等工作，他都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我是大会堂建设的‘活档案’，我对大会堂是有感情的。”李国胜动情地说。

“对于大会堂这样的大跨度建筑，很多方面都突破了当时的记录，保证质量是第一位的，这对结构设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李国胜说，结构设计不仅关乎建筑主体的安全，还要配合造型细节的美观，考虑到大理石、花岗岩等墙面处理和花灯安装，同时也要适应各种复杂机电设备的安置和操作。

没有先例可供参考，也无外援可以求助，最关键的是留给设计师的时间也极为有限。为赶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之前完工，大会堂的建造采用了非常规的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做法。“如果结构大样弄不出来，后续施工就没有时间了。”李国胜解释。

面对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李国胜和同事们信心百倍，写下了决心书和保证书。李国胜清楚地记得，为了密切配合施工和备料，把设计院和工地之间不足4公里的车程时间节省出来，他和同事们于当年12月便搬到工地进行设计。那段时间里，画图桌旁整天都围满了工人师傅和备料人员。没有计算机，也不懂系统工程学，设计工作千头万绪，加班加点早已稀松平常。

在党的号召下，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紧密团结，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为了尽快出图，50多人的结构团队苦干加巧干，打破常规顺序，简化绘图方法，确定了统一的设计资料、计算步骤，还制作了大会堂工程专用图表。“这些做法对于提高效率、保证质量、便利施工起到了重要作用，集思广益是大会堂得以胜利建成的宝贵经验。”李国胜这样评价。

最终，结构组只用了3天就画出了基础刨槽图，又用了3天画出基础施工图，后用1个星期画出地下室顶板结构图，累计出图3600余张。

时至今日，李国胜依然保留着大量当年建造大会堂的图册、小结、工单等。他说：“我岁数大了，当要追溯某些具体问题，图纸资料是很重要的，大会堂的资料坚决不能丢。”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市开展房屋大检查，40多岁的李国胜爬到大会堂顶棚里，里里外外详细检查。此后的40多年里，人民大会堂陆续进行抗震加固、消防改造、外墙保温、设备更新、增设空间等多项工程，每一次都少不了李国胜的身影。2020年，大会堂北京厅、山东厅进行升级改造，精神矍铄的李国胜老人家依然活跃在第一线。“虽然我从1959年9月16日就离开了大会堂工地现场，但是大会堂的结构设计是我参与的，我要对它终生负责。”李国胜说。

在李国胜眼里，人民大会堂蕴含着劳动人民的心血，也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回忆起那段干劲冲天的红色岁月，有着65年党龄的李国胜百感交集：“建筑就是历史，建筑就是文化。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能参与这场伟大的实践，是我莫大的荣幸。”

